



日本保存中国文化典籍初探

李春光

在中日两国密切的文化交流中，书籍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的文化典籍输往日本由来已久且数量庞大。早在公元285年的西晋初期，百济博士王仁就已经把《论语》十卷、《千字文》二卷带到了日本。隋唐时期中日关系日益频繁，中国书籍输往日本的数量空前增多。留学生“所得赐赆，尽市文籍。”^①吉备真备一次回国就携回《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一卷，《乐书要录》十卷等许多典籍。学问僧元昉回国时也携回经论章疏五十余卷。对于中国的奇编异帙，他们不惜重价购求。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二百余年，到唐中叶日本的中文书籍（日本称“汉籍”）已相当可观。据当时的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记，已经藏有汉籍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而新旧《唐书》艺文志所记是三千多部，五万多卷。就是说日本的藏书部数是唐的二分之一，卷数是唐的三分之一，俨然初具中国藏书的规模，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叹。到了宋代虽然两国关系不如唐代那样密切，但日本僧徒来宋朝拜圣迹以及民间的贸易往来却是经常不断。宋代是我国出版书籍的发达时期。宋版书极受日本欢迎。许多僧徒把大量宋版书籍带回日本。日本泉涌寺的名僧俊栲在1211年来宋归国时，除携有律宗大小部文三百二十七卷，天台教观文字七百一十六卷，华严章疏一百七十五卷等

佛教经典外，只有儒书二百五十六卷，杂书四百六十三卷，法帖、御笔、堂帖等碑文七十六卷，共达两千零一十三卷。这不过仅是其中之一例。至于通过商船输往日本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元代尽管发生了文永，弘安之役两国关系空前险恶，文化交流曾一度中绝，但总的说来，僧徒和贸易的往来并不亚于前代，书籍的输入不仅仍在继续，而且由于此时日本的出版事业兴旺，大量翻刻宋元刊本以及唐式版本的书，所以使中国传入的佛经，儒家经典，以及诸子百家之书在日本更加广为流布。明代中日之间，建立了官方的外交关系，并进行了定期的勘合贸易。日本对中国一些反映新的文化成果的书籍的亟需，为勘合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从《善邻国宝记》中所记的第四次遣明使开具的需求书目中可以略见一斑：“书籍……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伏希奏进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

《教乘法数》全部，《三宝感录》全部，《宾退录》全部，
《兔园策》全部，《史韵》全部，《歌诗押韵》全部，《遐斋集》全部，《张浮休圃埭集》全部，《遁斋闲览》全部，
《石湖集》全部，《类说》全部，《挥麈录》全部，《百川学海》全部，《老学庵笔记》全部。

另外几次勘合贸易的书目也大体与此相仿佛。随着中国书籍的大量输入，日本出现了专门经营经史子集的“唐本屋”，可以想见中国书籍在日本广泛流传的盛况。

从明末以后一直到清朝，中日两国文化的往来可以说是自唐以来的第二个高潮。当时日本正是江户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德川幕府“投戈讲艺、专欲以诗书之译，销兵革之气”。^②于是振兴文教，把儒家思想做为统治的思想武器，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需要远非前代所能比。数以万卷的书籍，泛海运往日本，其中“诗文集及类书为多”，像《古今图书集成》这样大部头的书就是这时期分批输入的。《康熙字典》等输入日本后还多次进行了翻刻。“乾嘉之间，考据之学盛行，日本争购其书”。^③书

籍的输入越来越多。这样经千百年来的日积月累，中国典籍在日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不可胜计。日本诸藩，各个寺院和许多学者都有专门用来藏书的书库，书楼，书堂、书屋。至于朝廷幕府的文库“所储秘籍，浩如烟海”^④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另一个天地。

中国文化典籍的大量输入日本，对于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中日两国的许多学者做了并继续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无须赘述。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文化典籍在日本的广泛流传，保存了中国典籍，为中国寻求丧失了的佚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场所。这的确是中国的学者感到兴奋的事。

中国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珍贵的文化典籍。与此同时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我国的文化也多次地遭到了摧残和破坏，丰富的典籍大量地被焚毁或丧佚。这就是所谓书的“厄运”。隋代的牛弘曾提出书的五大厄运之说。明代的胡应麟继其后复有五厄之说，分别回顾了我国文化典籍在历史上遭破坏的情况。概括起来我国文化典籍的遭受的损失主要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于认为不利于他们统治的书进行野蛮地焚毁查禁。最著名的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和清朝乾隆的毁书。单是后者自乾隆三十九到四十七年就毁书二十四次。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

（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而引起的战乱在中国的历史上次数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范围比较广，斗争又比较激烈。许多书籍遭受其祸。王莽之乱，书籍被“焚烧无遗”，^⑤八王之乱“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侯景之乱“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⑥还有安史之乱，五代之乱等等无不如此，不胜枚举。另外由于民族矛盾而引起的战争如“五胡乱华”金人南渡，蒙古灭宋，清兵入关等也使书籍蒙受了巨大损失。

(三) 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使一些重要的典籍（尤其科学方面的书）因不受重视而湮没。明朝设科取士许多人只顾追求功名，五经旁训之外不知有九经十三经，至于其他方面的书就更无足轻重，所以朱彝尊在《文渊阁书目》跋中感叹地说：“自设科专尚帖括……不敢旁及诸家、秘府所藏，士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矣。”总之，书籍在我国受到的浩劫，使我国古代的典籍不仅在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在种类上也多有缺逸，甚至有许多重要价值的珍贵文献绝迹，虽屡经搜辑而不可复得。这对于中国文学、史学、文献学，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

然而我国传到日本的文化典籍却较为“幸运”。这是由于：

(一) 日本虽然也多次地发生战乱，但从整个日本历史来看，次数比较少，时间比较短，范围比较小，激烈程度也远不如中国，日本遭受的唯一一次元军入侵也没有给日本本土造成什么大的祸乱。这就使书籍毁于战火的机会大大减少。

(二) 没有发生象中国秦始皇和清朝乾隆年间那样大规模焚书的事件。就是在德川时期出现了禁书的事件，也主要是针对西方耶稣教方面的书，中国的书只要和耶稣教无关，不加任何限制。

(三) 注意保存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典籍尤加爱惜。正象林述斋在《佚存丛书》指出的那样：“右文之化，稽古之风，历千载而弥盛。故使凡出于古者今皆不至于废替也，……即西土（中国）撰著传到此间，辄亦永存不灭”。

(四) 中国传去的佛经不仅保存在日本的寺院里，而且其他方面的书籍也以僧徒为媒介传到日本，并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有许多也保存在寺院中。日本崇尚佛法，“兵争例不毁佛寺，千年古刹、崔巍相望，若东大寺，石山寺，法隆寺，不惟大小乘律牙签无恙，即九流四部亦多出其中”。^⑤

(五) 日本气候适宜：“无我江南之多霉烂”；保存得法；“其国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虽屡经火灾而不毁”；纸质优良

“钞本皆用彼国茧纸，坚韧胜于布帛，故历千年而不碎”。^⑥

所以许多输入的中国书籍在日本“守而不失，真本永传。”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之多足以使我们感到惊叹。“夏殷三代之鼎钟六朝隋唐之遗卷往往有存者。”^⑦尤以唐代的古钞本旧钞本最为丰富，雕刻精良的宋版书也相当之多，元本明本之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同时式样繁多，有卷子本，蝴蝶装本、折本、巾箱本等等。其中有不少是在中国久已亡佚的书，有的则成为“海外孤本”。这些佚书引起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尤其是中国方面迫切希望它们能重新在祖国传播。

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从日本得到的佚书是日本名僧裔然送来的《孝经郑氏注》。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强藩擅权，海宇鼎沸，典籍文物，荡亡殆尽”。^⑧加之，五代五十余年的战乱，书籍的散佚就更严重了。宋初正大力征辑佚书，裔然可能听说此书在中国已佚才送来的。当然当时佚失的书很多，日本送来的佚书也不止这一部，随着日宋商船的来往，不少佚书又重新返回祖国。无怪乎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说：“徐福行时书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诚然这不可能是秦始皇所焚之书，但这却是他看到前代所佚之书从日本归来而发的感慨。这说明早在北宋时期日本就已为保存和送还中国佚书而做出了贡献。

中国大规模地从日本搜求佚书主要是在清朝中叶以后。在嘉庆年间日本学者林述斋（号天瀑山人）已经发现了不少我国在日本的佚书。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保护，曾指出：“余尝读唐宋以还之书，乃识载籍之佚于彼者（中国）不为鲜也。因念其独存于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则天地间无复其书矣。不已可惜乎”！^⑨所以他付出了很大代价，经过考证，取“佚书百篇今尚存”之意，辑成《佚存丛书》共六帙十七种一百一十一卷。每卷末各附有跋注，记其收藏源流，其中基本上都是我国久佚之书。此书传到我国，对学术界震动很大，并将其书重新付印。有些书又收到阮元编的《四库未收书目》中。引起了我国许多学者的重视。

继此之后在光绪年间杨守敬做为黎庶昌的随员出使日本，对佚书进行了空前的搜求。他不遗余力，广搜博访“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其虽无秦火不焚之籍，实有奄然未献之书”。为此他专门写了《日本访书志》十六卷，书中提到搜访的佚书有235部近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是罕见的旧钞卷子本，旧钞本，宋槧本以及其它“稀世秘籍”，“亦有彼国习见而中土今罕遇者，又有彼国翻刻旧本而未西渡者”。^⑩在《访书志》中可以看出杨守敬搜求佚书、煞费苦心，发现踪迹，即追根朔源，必欲得之，方算罢休。遇到难得之书，虽“索价殊昂”也忍痛购买。在日本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些藏在日本秘府的珍籍也得亲睹，并把它模写仿刻下来。光绪十年（1884年）在他的赞助下，黎庶昌把许多重要的佚书，辑为影印本的《古逸丛书》。其中有旧钞卷子本《玉篇》零本、旧钞卷子本《玉烛宝典》、《文馆词林》、《调玉集》、北宋本《姓解》，宋本《史略》、《太平寰宇记》、《谷梁传》、正平本《论语集解》等二十六种，二百余卷。紧接着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傅云龙编辑《饗喜庐丛书》影刻了旧卷子本唐《新修本草》残十一卷，宋本《二李唱和集》，唐卷子本《论语十卷》等多种，都是罕见的古代佚书。“五四运动”后和建国初期搜集佚书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商务印书馆又编辑了《续古逸丛书》四十七种，其中也有一些影印的在日本发现的佚书。其他许多学者在日本还发现和收辑了不少小说，戏曲、平话等古代文学作品及科学技术著作，佛教经典等古代文献。

这些佚书的保存、发现及重刊使许多湮没已久的古籍重放了光彩，对我国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对我国文学、史学、文献学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叙述。

一、文物价值：我国在日本的佚书不少是宋以前甚至是隋唐以前的珍品，是我国罕见的历史文物。对于我们了解书的原来风

貌，书的源流和变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日本学者称德川氏的红叶山文库所藏汉籍“概皆钞刻绝伦，精华焕发。士子视以动心骇目，叹为奇绝”^①又称“我邦所传古钞本，具存隋唐之旧真、为宋元人所不能睹，而岿然独为灵光之存此为绝佳之种，皆出宋元古本之上”。^②藏在日本枫山官库的古钞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中国没有即在日本也是唯一的足本。日本学者森立之称它为“绝世仅有之珍函”。并指出这样装成卷轴的古钞本“皆李唐遗本，竹帛之余馨，仅存于今日者，其为可贵亦固非南北宋槧比也”。^③杨守敬也叹称“真六朝旧笈也”。藏在尾张真福寺旧钞卷子本《瑠玉集》零本二卷，虽然残缺不全，但文字遒劲“似唐初人笔迹”也被认为是“罕见之宝籍”。^④被黎庶昌收辑在《古逸丛书》中的旧钞卷子本《玉篇》零本一卷是南朝梁时顾野王所撰。黎庶昌和森立之都认为是顾野王的“原帙，”黎又赞道：“逸千三百年而幸存……虽仅十分之一，足可视为瑰宝”^⑤其它如李唐人真迹卷子本《汉书》中的《食货志》、古钞卷子本《世说新语》《唐会要》、宋刊本《史略》、《荀子》等也是在中国见不到的珍籍。

二、校勘价值。由于日本保存了大量的旧钞本，这些钞本有的是李唐真迹，有的是直接原于李唐的传钞，又保存六朝俗体和当时碑砧的余风，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和中国以后辗转相抄而失其真的一些版本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些刻印本也和中国的版本不一定属于同一个源流，这样在校勘学上具有很大的价值。可以订正我国现存版本的许多错讹夺脱。杨守敬看到日本古钞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后和我国的版本一对照，感到“其中误者之迹真令人惊心动魄……。其有释文不载为唐经宋槧本所夺异同，不可殫述”。^⑥其中对讹误的一些纠正，有的是一字千金，对于理会原文至为重要。收辑在《饕喜庐丛书》的旧卷子本《论语》十卷出于开成石经未刊以前，和现在的集注本对校其所不同就有三百处之多。藏在日本高山寺的北宋槧本《齐民

要术》零本三卷虽已残缺，却都是稀见的善本，而我国所传的毛晋刊本误脱满纸，几不可读，第五卷桑柘篇还缺一页，而此本这一页却完好无损，其它据以补正处也很多。另外日本的许多“和刻本”源于宋版，所以在校勘上就具有和宋版同样的价值。日本贞享刻本的《和靖先生诗》二卷就是源于北宋刊本的和刻本。这比我国明代沈行、清代吴调元的刊本优越得多。贞享刻本“秋怀以下六首全篇宛在，竟为沈行、吴调元刊本所脱”“其它字句异同，更难枚举”。^⑰日本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各种中国已经丧失的版本，这为中国校对古籍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依据。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参考日本的保存本就有七、八种之多。近几年来我国的许多新版的古籍，就是以日本保存的书籍为蓝本而校订的，纠正了许多错误，大大提高了版本的质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文献价值。我国有许多重要的典籍，或因兵燹，或因散失，而缺卷、缺册，甚至所剩无几，成为极不完整的残卷，实在可惜。但是一些残缺的部分在日本发现了。宋版本的《太平寰宇记》是由乐史编著的北宋地理总志，兼及经济文化，徵引书籍至百余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原书共二百卷。可是后来宋版本根本看不到了，仅有的四库本也缺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九卷，共计七卷，而在日本的枫山官库却保存着宋版本的《太平寰宇记》残卷。正好有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八卷，计六卷，只缺一卷，为杨守敬访得，立刻影照刻补，虽尚有缺佚，但也几成完璧，实可庆幸。宋代王怀隐奉敕主编的《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是北宋时期一部重要医学著作。但中国仅有眼、齿二类三卷，其它亡佚无存。而日本保存的旧卷子本的《太平圣惠方》却首尾完具。又如日本古钞卷子本《王子安文》一卷（是王勃的文集）共三十篇，我国仅存十七篇，其它十三篇则已失传。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日本存本来弥补我们的不足，使我国残缺的古籍，得以恢复原貌。

另外有不少的佚书又保存不少佚文，可以说是“佚中存佚”

如《秘府略》残本三卷“所引书多亡佚之本，即现存者多有异同”。^⑧隋朝肖吉所撰的《五行大义》五卷“其所援证往往有佚亡之书，今不可得见”。^⑨宋朝高似孙所著的《史略》“多载逸书，实为读书家不可阙之书”。^⑩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些佚书的文献价值。

四、学术价值。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日本发现的许多书，在我国不仅没有最早的钞本和刻本，就是重刻，翻刻，续刻的版本也没有，是我国完全绝迹的书，这就填补了我国学术文化领域的许多空白。唐代许敬宗奉敕编修的《文馆词林》分类纂辑了从先秦到唐初的各体诗文，是继《文选》之后的最早的诗文总集共一千卷，北宋时已发现亡佚，历近千年不闻踪迹，直到十九世纪初日本学者林述斋才首先发现其残卷四卷，辑入《佚存丛书》后“中土惊为秘籍”，影响很大。继而森立之又发现六卷，杨守敬扩大线索又搜得九卷，并得到日本朋友提供的其国尚存的三十卷目录，又有所发现，这样先后共得二十余卷。分别辑在《古逸丛书》、《适园丛书》中。这些发现为我国研究隋唐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日本发现最为丰富的是元、明、清的小说、戏曲、平话等文学作品。解放前我国一些学者先后从日本的《内阁文库》《尊经阁》以及日本私人藏书家中搜辑了《元至治刊平话》五种，《熊龙峰小说》四种，《明代徽调戏曲散出》多种，《全像古今小说》四十卷，《二刻拍案惊奇》三十九卷，《喻世明言》二十四卷等数十部。这些作品不仅在我国早已湮没，即在日本有的也是“天壤秘籍”极为可贵。解放前后都已出版，重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这不仅对于研究元、明、清的小说、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社会历史面貌也是有所帮助的。

日本对于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书保存得也不少。明代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是我国和世界科学技术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与科学

成就，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这部书初版于明末的一六三七年，宋应星在序中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正因为如此，这部书在奔竞功利的封建社会里得不到重视。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授时通考》两书仅有摘录，但没有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此书传到日本后，在整个德川时代成为普遍阅读的中国书籍之一，并在明和八年（1711年），出版了日本刻本。1926年中国学者从日本带回翻刻本并将其重新刊行。1956年我国也发现了一部此书的原版书。日本对中国的医学非常重视，保存的中国医书也相当之多。《经籍访古志》的医部之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中国已佚的有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黄帝明堂》，唐官修的《新修本草》等重要古代医籍。其中《新修本草》尤为引人注目。它是唐代李勣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撰修，共二十卷，是在总结前人本草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的药物学著作。书成七十一年后即由遣唐使传到日本。这部书我国在宋以后就亡佚不传，而在日本却保存着卷子本《新修本草》十一卷。“实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籍，”日本学者狩谷卿云发现后即把它影摹传世，“于是神光焕发，世始得窥古本草之真”^② 这部书的发现及其传回我国，对于药物学和中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在日本的佚书的发现，也有助于我们评价人物，弄清思想源流。梁启超在谈到怎样给玄奘做传的时候，曾提到玄奘的弟子园测的书，经唐武宗毁佛寺、焚佛书以后在中国已丧失，“幸亏流传到日本去了”。并指出：“道宣的《续高僧传》说园测并非玄奘的学生，不过在末席偷听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在园测的书未发现以前，看去似果真和玄奘不相干，近来日本人修续藏，找他的书找出来了，传到中国才知道在法相宗占有很重要的位置”。^②

总之中国流传到日本的佚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和价值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不能一一介绍，只能就其主要者加以概

论。有些佚书需要专家进行专门的研究。

注：

①《旧唐书·日本传》。

②③黄遵宪：《日本国志》。

④⑦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

⑤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六。

⑥⑩：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

⑧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后序。

⑪鸟田翰：《古文旧书考》发凡。

⑫海保元机：《经籍访古志》序。

⑬⑭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一、二。

⑮⑯《古逸丛书》。

⑰⑱⑲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十四、二。

⑳林述斋：《佚存丛书》。

㉑㉒㉓森立之：《经籍访古志》附录。

㉔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